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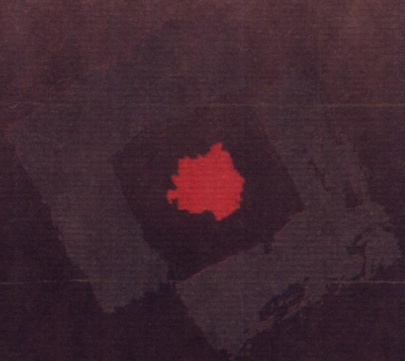
世 纪 蓝 图 丛 书

世纪蓝图
shijilantu

梁燕城 著

破晓年代

后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



东方出版中心

“世纪蓝图”丛书

主编	梁燕城		
编委	王元化	李慎之	成中英
	汤一介	杜维明	庞 朴
	柯秉柔		

序 论

一、后现代文化的图景

后现代文化的图景,就像一混沌的碎形世界,全体是各自分散,连起来又是波涛起伏,没有统一的图画。但如何在混沌中发现秩序,纷乱中构作出普遍意义,并使多元分立的世界得彼此感通,将是当前哲学的课题。从事后现代中国哲学思考,第一步必先走出现代哲学固定的思维框框,第二步则避免进入后现代主义所陈设的飘忽散立思想。然后针对世纪交替的哲学课题,作原创性的自由思考。以开放心灵容纳多元的文化处境,但在开放的同时避免虚无主义,另一方面在不接受权威及后设传述(metanarrative)的独断论述时,仍有对真理与普遍性的信念和追寻。那是在虚无与独断之间不断的平衡和摸索。

所谓走出现代哲学,是指摆脱康德那主体为本的思考,不预先假设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亦即不接受启蒙运动所定的框框。在中国的近代哲学反思,乃是摆脱建基于康德主义的牟宗三派新儒家模式,拒绝把中国哲学锁定在道德形而上学之中,但这不

是否定它,却是在其影响下的重新反省,是后牟宗三、后新儒学反思走向开放和多元的思维模式。

所谓避免进入后现代主义,是指排除“后设传述”时,并不陷入李奥泰(Lyotard)的并行不悖学(paralogy),以为一切思想或学派均并行而不能沟通。亦指批判语言与现实之关连性时,也不走进结构与解构之相生相破,却重视从否定以呈现真实的进路,在整体眼界下使多元的碎片得以彼此沟通,而达到和谐,走向成中英先生所谓的“后后现代”,或罗辛纳(Rosenau)所谓“肯定的后后现代主义”,寻索一种非教条性的建构思想。

这是一思想的探险,并非创作一大哲学体系,而是从一思路去行出某种方向,辗转地发现在所有似乎是蔽塞无路之山穷水尽处,总获得柳暗花明的新眼界。在迂回前行中,走过不同哲学反省的经验,发现多元不同的观点和体悟之间,并非封蔽散立、各自分隔,却有通道,可从一边转化向另一边,以致多元相异之思想间,有道路可贯通之,而形成感通和谐。

这思路的灵感,仍是始于新儒学,但并非来自牟宗三的独断体系,却来自唐君毅的开放性思想,从人生体验去走过不同的心灵境界,建构了多元间的通道。牟宗三的系统不能肯定多元,只限于现代;唐君毅的容纳多元,属后现代,但因多元间能感通,故又不陷入后现代那种散立的虚无之中。

从唐君毅的心灵境界观,可不先假设主客对立,而纯从心灵所觉的世界现象开始,故这思路始于一种人生现象学,以“心灵本真直觉”与“生活世界”为哲学探险之始点,落实于人生具体的经验,而求描述出不同的普遍经验与境界,从人生以贯串起中西哲学不同的体验,从体验有普遍意义,而不落入主观之中。但普遍性又有不同层次与范围,各不同者可多元并存,并行不悖,但又彼此相通,不落入相对主义。

二、网络宇宙

后现代文化的另一特征,为一信息社会的建立,因着电脑网络的出现,世界的政经权力中心亦将转变,不再像从前以拥有生产工具为权力来源,而以拥有信息及信息科技为其重心,人文领域亦将形成一网络世界。故思想文化必然是多元并举,不可能有意识形态定于一尊。

在现代盛极一时的个人主义,在多元冲击下,将失去共识与对话,演变成孤离的自我中心主义,而形成社会的严重分割,单靠民主和法治的外在规范,难以统合出共同观点。这必产生沟通科技进步,但人却不能沟通的危机。

后现代危机的纾解,当在解除原子性的个人主义观点,而建立网络中的人观,以配合网络世界的进展,依网络关系而重建人与人沟通的基础。

正因如此,后现代的中国哲学,须解除牟宗三式的主体为本哲学。牟先生的建构是精深伟大,不可多得的系统,但其地位亦正如康德之在西方,是一历史研究的对象,其影响至今仍在,但却不是回应后现代文化的精神资源。

唐君毅的境界哲学,并无严格的主客区分,却从人生体验进程及智慧灵光自觉中,化解主体客体的理论对立,同时强调“道”这观念作为不同思想文化之间沟通的通路,不同者可在沟通和互相进入之中,得以并存而和谐,这是一网络为本的感通哲学规模,极具后现代的洞见和智慧。

此外,在西方哲学方面,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发展,亦是化解主客对立的思维,极须注意。但发展到存在主义,又陷入原子性个人主义的陷阱,故萨特哲学使这现象学思潮无疾而终。

现象学的发展须配合唐君毅的境界观,结合吕格尔的诠释现象学方法,描述人生和文化不同境界的现象,而打开一条通向具体普遍性的思路,以境界为不同层次具体普遍性的彰显,使中国修养工夫中的境界,可立在一普遍基础上描述,不陷于纯主观与文学式的感受,并立出不同境界间的网络性通路。

此外,西方当代科学的新发展亦须注意,大爆炸论、混沌理论及量子力学,均有极深的形而上学意涵,其展现的亦是一网络世界,这是物理上的网络,可与人文领域的网络呼应,以至多元并举之同时,有统一性的宇宙性理解,这统一的宇宙将是一交光互影的网络及和谐世界。

西方哲学中最早依此观念建构的是怀海德(Whitehead),但其体系已略陈旧。能回应最新发现的哲学系统者,是科学家波姆(Bohm),其对量子力学的解释,将与中国式的网络宇宙观接合,而重建后现代的沟通与和谐。

以上都是从事思想探险时的一些反省资源。将中国古典哲学的智慧,放在后现代课题中消融重组,产生了本书的著作。这思路始于29岁时用故事体裁写的《慧境神游》一书,至今已过18年,才整理思路,以学术方式表达出来,算是早年反省的一个记录。

主要反省的系统可见诸《后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一文,此文还有两篇文章,论述从空的境界转向道天及上帝的境界,唯因过了截稿期才完成,未能放入本书中,但思路可从以后的《真理之常与变》、《从常变到创性》、《性情的形而上学》及《感通与恩情》四论文中见。盼以后能彻底完成这贯通各境界的构思。

本书各论文的详细注释,请参考《文化中国》第二期至第十八期发表的原文。

第一部

从中国哲学反思后现代思潮

何谓后现代文化

——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

何谓“后现代”

当前欧洲思潮环绕着一个重要的名词讨论,就是所谓“后现代”(postmodern)的争论与界定。卡平灵在其书《后现代主义的“非内容”、理论及实践》中指出,后现代的观念是从现代发展出来而对现代文明的“文化突破”(或译作对现代文明的“文化中断”),也可以说是对启蒙运动塑造的科学和理性文明加以全面反叛。

“后现代”这个词有两方面的应用,一是社会科学角度所谓“后工业社会”,指现代以后的“后现代性”,是哲学、艺术与文化角度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指对现代文化加以批判和“解构”的文化运动。

最早提出“后现代”一词的人物是汤因比,于1939年的《历史研究》第五册中,他提到第一次大战后的新社会为后现代的,到第二次大战后出版的第八册,指出“现代”是指西方的中产阶

级文化,当布尔乔亚阶级的人数足以操纵社会时,即“现代”开始,但是从城市劳工阶层及世界各民族和宗教兴起后,就是后现代时代的来临。汤因比能洞见新时代的来临,确具历史家的眼光,但其对新时代的认识仍十分肤浅,倒是在他之前的彭迪在1922年出版一书《后工业主义》,更能指出了“后现代”是工业时代的终结,其后麦洛肯在五六十年代指出这时代是以电子传媒系统为本的新世界,图拉宁于1967年认为后工业时代将产生一全新的、以科学政治为本的程式化社会,统治阶层则是技术官僚。

贝尔在1976年发表其名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认为控制新时代的并不是科技,而是具有理论知识及头脑与资讯的人才。在这社会的经济重点将由货品生产转向服务行业,职业分配着重高层的专业及科技人士,社会的主轴原则是以理论知识去定政策,未来方向是要控制科技及科技评估,决策过程将会创造一种智能科技去运作。

种种研究皆指向一结论,后现代性的特质,将是一资讯社会的来临,这新时代将以拥有资讯和传媒者最有权力。

至于文化方面,所谓“后现代主义”则是一多层次多面向的反省,集中在怀疑、批判和摧毁现代文明那专断性的科学和理性标准,否认科学的权威性,强调所有文化和思想平等而自由地并存发展,因而开出灿烂的新文化领域。

后现代主义评科学的霸权

后现代主义一词非常难以界定,有人用之以形容艺术上对现代主义加以反叛的运动,如后现代建筑,反对现代的装饰形态,求更不传统和不和谐的表现(如香港的汇丰银行和中国银

行)。也有人以之形容当前的社会特质,如詹明信即指出后现代是“操控地全面消费的科层社会”,布特里拉却认为这是一虚拟的年代,一切都只重外表的形象,由不定性所控制。或许我们可以总结说,后现代主义是一文化运动,源于20世纪以来那种文化解体的经验,尝试对这文化解体带来的不定性、虚无性及社会的控制性加以反省和理解,进而加以描述其特质,以自别于现代文明的种种现状,求开出一种无定之开放性体系。

后现代主义影响最大的人物,当是李奥泰,其《后现代处境》一书,于当前科学和文化处境作一整全的哲学反省,李氏认为后现代是对所讲“后设传述”的全盘怀疑,不再接受科学或任何权威的真理标准,亦不接受所谓“共识”的理论,却让一切不同文化并存发展。

他认为知识不等同于科学,知识不单是一套描述性的语句,却是要学习到如何的实际行动,这种实践的知识往往要通过传统的传述方法来传递,如古人以唱戏或讲故事来带出道理,用各种语言游戏的规则,以不同方式叫人聆听,并在此树立了传述的权威。

但近世科学兴起,建立一种新知识,以为必须通过逻辑和提供证据去检证或否证一些语句,就可以确定某论述与真相印证,这种知识只承认一套语言游戏,慢慢发展成一种专业和机构,对所有其他的传述知识加以审判,认为都是缺乏证据的,原始而落伍的思想,科学逐渐成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并且认为自己的霸权是合法化的。

李氏指出,所讲“现代”,就是相信有一套合法化的知识,成为一种“后设传述”,并可审阅一切其他传述。但这时代已过去,科学并无特别的合法性,它只是多种语言游戏中的一种,其合法性只靠那些承认这套游戏的团体去同意,是靠权力去建立,却不能客观地证明自己,科学和任何传统的神话和传说一样,只

是一套传述而已。

李氏认为,后现代就是这种具霸权性的“后设传述”崩溃之时代,最前卫的后现代思想将要承认一切“并行不悖”,而基于一种新学问:“并行不悖学。”

后现代的“并行不悖学”

李奥泰认为自二次大战以后,各种庞大的传述系统均已失去其可信基础,因为科技已滑转了重点,只讲工具性的运作,而资本主义则重视个人享受商品和服务。

现代化的玄思系统往往想建立庞大系统去使一切知识得到联系与定位同时保住了科学的合法性,但这些系统往往不能自己证明自己,19世纪末以来,各大传述系统已被视为一些思想游戏,科学和知识的合法性基础正一步步地溃落。科学的“非合法化”过程就形成后现代的观点:“科学只能玩自己的游戏,无能力去判别其他游戏合法性。”

有时我们见到一些修读过大一思想方法导论的学生,到处用其所谓理性的原则,去检查和判定他人说话的语句,对于所谓不清楚或无证据的语言认为无认知意义,加以嘲笑藐视,这就是典型的现代思想,视科学为检证一切其他语言的一套“后设传述”。但这在当代欧洲前卫思潮看,却是落后和狂妄,当科学的语言未能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时,就不外是各语言游戏之一,而无权去判其他语言游戏。李奥泰指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点,正是后现代世界要去发挥的。

后现代时期的科学,已改变了从前决定论形态的思想,一切都随着处境的变化而发展,知识正在失去其典范性与预测性,各

种信息均不完整,甚至产生矛盾,任何控制均不全面。故李奥泰认为必须用游戏理论去看后现代的科学。由此而提出其“并行不悖学”的观点。

“并行不悖学”,就是指出在任何自称评断一切的后设传述崩溃后,各种理论或语言游戏均可以并行不悖,再没有一套知识的霸权。任何理论都未发展完成,故可各自发挥。新的科学模式将反对一套稳定系统,却是一开放系统的模式,其中的语句之所以被认为合宜,在其能引发新观念,即引发其他语句与游戏规律。当前科学实用运作的并行不悖学活动,是要指陈科学游戏的后设规定,及诉求各游戏玩家去接受不同观点。

李奥泰指摘哈贝马斯(Habermas)的共识理论,称所谓共识理论即认为人可通过对话去建立双方的同意,及可改造一系统的表现。李奥泰认为共识是不可能达至,因为各派均在争论中,而且共识常常是一种工具,去成就权力,并使一些系统得到合法化基础。

与其用共识去建立权力,不如让所有理论或语言游戏各自发展,并行不悖,后现代世界将是容让一切多元并行的年代。

德理达对人文主义的解构

当萨特大讲存在主义即人文主义的时候,海德格尔却反对将自己归入人文主义的范畴中,他在《人文主义书简》中批判人文主义是一种既定的形而上学思想,视人的主体为宇宙的中心,认为人有普遍本质,海氏以人只是一时间性的“在此存有”,否定人文主义的主体哲学。

法国的一位当代思想大师德理(Derride)达写《人的本质》一

文,批判海德格尔仍在寻索一种人的共同尊严,基本上仍未摆脱人文主义那种人的本质观,要求追寻“事物本身现有的本质”,仍是本质的形而上学,或主体的形而上学那种传统格局,德理达遂要对之加以“解构”破斥。

德理达有句名言,就是“一切事物没有那么简单”,人文主义的人观往往给人一些简单答案:如人是道德主体,人性有尊严,人有本质价值,或谓人是欲望的存有者等,用一两个简单清楚原则,高举一两套主义,评断天下一切,为时代提供简易的答案。德理达指出所有这些大哲学,均可在其边缘发现其矛盾,而加以破斥解构。他研究各派哲学,不是要让人去理解其理论,却是要叫人发觉这理论原是不可理解,矛盾重重,根本就没有意义。故他不是去重构一哲学,却是去“解构”之,说明任一理论都不行,都是自我解消。哲学应是一实践,揭示“无有”,而打破“现有哲学”的框框,哲学若陷于“现有”事物,就永远陷于由界定而来的界限与迷执,只有即时破斥,才可释放。

人文主义对“主体”、“意识”、“自主性”的界定,都把人放入框框中看,故德理达否定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认为康德及启蒙运动以来的形而上学人观,及哲学人类学,均用一套理性理论去套住具体的人,最后就是非人化。不论是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或结构主义的观点,均逃不了这种“非人化”的框框,当然中国新儒家强调的道德主体和道德意识,亦当被判为非人化了。

德理达更发表其巨著《格文学》,指出没有任何语言系统真能反映外物,传统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总想找个定点去保证知识的真实性,其实这只制造各种理论的狂妄和偏见,德理达批判传统太重视语言和言谈,他认为文字更重要,因为文字可以写完加以涂掉,随写随破,才能揭示无有,才能突破人文主义与形而上学的框架。故由德理达的“解构”思想去看,现代学人常自我认定为人文

主义者,其实都是一种虚妄迷执,自设新框框去拘限自己。

总结言之,面临 21 世纪,所谓后现代时代的来临,人类回首一看,才知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文明,神化所谓个体、理性、科学和进步,及其所牵连的主体哲学、人文主义、唯物主义与实证主义,原来都是一些独断肤浅教条式肯定,并不是宇宙的真相,人类常常根据某一年代所流行的知识去架构世界观,建立意识形态,以为代表真理,使知识变成权力,但时代过后,才知这原来是一种迷执,一种虚妄,现代人嘲笑中世纪的“日心论”,相信后现代人亦嘲笑现代的唯物论和进化论。或许多人反省历史的演变,就多了解自己所执着的往往是基于狂妄和愚昧。

后现代文化的核心课题

——沟通的重建

综观后现代文化,从社会学角度看,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的结构将由工业为主轴转向资讯为主轴。从哲学角度看,是启蒙时代的结束,是科学、理性及人文主义的崩溃。

启蒙时代的基本思考和沟通模式是,预设了一种“主—客”对立的架构,视物质规律和科学方法是客观,而艺术美感、道德价值和宗教真理是主观,其高峰的思想是将宗教的真理性和普遍性相对化,以科学才代表客观真理,但是后现代思潮推倒了这种“主—客”对立模式,使一切重新开放,找寻新的定位。

“主—客”定位的架构瓦解,使后现代成为一沟通困难的年代,各派有各派的传述系统,并行不悖,没有共识,没有客观的对话条件,以致很难有沟通。而现实上资讯的革命,使人与人之间可用各种新机器通消息,沟通似乎多了,但机器传讯却又减弱了

人与人的情志和人间沟通关系，且资讯很易被误解和扭曲，加上政治和经济的操纵，更形成有权力者控制资讯，对沟通作有系统的扭曲，故后现代世界亦缺乏沟通的“社会条件”。

后现代主义的“并行不悖学”和“解构”思想，是拆毁性的思潮，成功地摧毁了科学和理性的霸权，但却基于虚无主义的设定，从先存的信念上否定了一切。但这种虚无主义信念却有一内在矛盾，即一方面认为各学派的传述无法建立共识，无法对话沟通，另一方面又不断写作批判各派思想，到处传扬自己一套，似乎又肯定了人与人之间有共通语言，有思想共识，可以沟通，那么当其传扬并行不悖学和解构思想时，是否已推翻了自己那否定一切的信念呢？

当虚无主义者在努力沟通自己那认为“人无法沟通”的观点时，已是解消了虚无主义的信念，肯定了人不论观点如何不同，仍是可以互相沟通的，这肯定即打开了后现代世界的哲学反思方向，去探讨人类沟通之所以可能的根基，并依此去重建沟通，批判资讯社会的沟通扭曲，这将是后现代文化的核心课题。

沟通的根基在人永远处于情际关系的脉络中。我们不须像人文主义者般界定人是一主体，用简单概念将人判定，却正面描述人与人的相关性现象，沟通是一不可推翻的事实，而沟通之所以可能在人与人处于相关的状态中，人在相关时，建立全面的，包括情态和人格的关系，发而为语言和行动去表达情态人格，并在情际关系中发展了理解和诠释的作用，而达到沟通。

“我一你相关”的思考模式

后现代文化和哲学解构了人文主义的主体观，摒弃了“主一

客”对立的思考模式，若不想陷入虚无主义的自我矛盾中，就必须转移向“我一你相关”的模式，而以人与人的情际关系为核心，在关系中看沟通的全面事件，而不须界定主体和客体。

在沟通的事件中，沟通者通过语言和行动去发出一些讯息，每一讯息不单是一套命题，而被限在语言中，同时也是用行动和各种语气表达出沟通者的感受、情怀倾向、以人格状态、意志动机等。我们总称这一切为“情格性”，在任何人与人的沟通事件中，人都表现为具情格者，而沟通所建立的关系是为“情际关系”。

“情际关系”中的理解，不能建基于主体认知客体的静态方式，却是在沟通的过程中逐步开显出互相的理解。正如一男一女相爱时的沟通，双方的理解不能以“主一客”对立的认知方式来决定，却是在过程中建立理解。沟通是一有机地相关而又不间断转变的过程，理解在这过程中一步步建立。从这意义下看的理解，只能是一诠释学的过程，而不是传统的认知过程。

诠释学意义的理解，是视沟通者双方均各有其原先的理解事物观点，有其意义系统，伽德默尔称之为一种“眼界”，这眼界是各自人生历史中形成的观点和偏见。然后在沟通的过程中，人与人传达的讯息遇见，双方均须以自己原有的眼界，尝试融入对方的眼界中，造成“眼界的融合”，因而产生理解。

从沟通至理解，是一眼界融合的诠释过程，每一“眼界”都牵涉了一知人的人生历史、先存成见，以及全面的情格状况，其中产生的诠释理解，不能是一客观抽离情格关系的认知，却是活生生地投入对方历史中，重新经历对方的经验，而形成对他人情格和人生历史的感应沟通，是为一种感通关系。

理想的沟通，是达致感通，而感通关系的基本模式，就是马丁·布伯“我一你相关”的模式，即沟通者必须付出诚意，视对方